

俄罗斯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

【编者按】 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经济得益于良好的原材料国际市场行情而高位运行,但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便处于下降通道中,2009 年为负增长 7.8%,2010~2012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4.5%、4.3% 和 3.4%,特别是 2013 年俄罗斯经济陷入低迷状态,预计经济增长率为 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均对俄罗斯未来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对于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重新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俄罗斯经济到底是患有“荷兰病”还是“俄罗斯病”?是有症状但没发作,还是处在“半荷兰病”状态?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和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难点何在?医治“荷兰病”有何药方?为此,本刊特约国内俄罗斯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以笔谈的形式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以期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和未来走势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测和判断。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经济结构问题,不论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始终是影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其经济发展模式。如果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不能改变,不排除俄罗斯经济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出现结构性下降乃至出现大幅度经济滑坡的可能性。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03 年的一份报告中就已指出:“俄罗斯应该加大力度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只有结构改革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减轻对能源领域的依赖。”20 多年的俄罗斯经济发展进程表明,上述看法是正确的。

俄罗斯独立后亦力图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但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经互会的解散,加工制造业部门的产品生产工艺落后,年复一年地生产老产品,从而使产品质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尽快使经济复苏,获取极其需要的、严重短缺的外汇资金以购买大量国内急需的消费品,不得不大量出口能源等原材料产品,这就成为其解决急迫经济问题的一个捷径。可以说,20 多年来俄罗斯经济一直没有摆脱对能源、原材料部门的

依赖,俄罗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化”十分明显:一是经济原材料化,即经济发展依赖能源等原材料部门;二是出口原材料化,俄罗斯出口产品按所占比重的排序,燃料能源产品占首位;三是投资原材料化,即俄罗斯投资相当大部分用于采掘工业。“三化”的结果使得在俄罗斯工业中能源和原材料部门的比重日益提高。1990 年,工业中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为 33.5%,制造业比重为 66.5%;到 1995 年,俄罗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已降至 42.7%,而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相应增至 57.3%;2004 年后,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走高,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快速发展;2006 年,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已达到 67.8%;2011 年为 66.4%。尽管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受国际市场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但它在工业中的比重一般都超过 60%。

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甘别基扬 2004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作的报告中提供的材料,1999~2004 年 6 年期间,俄罗斯 GDP 的增长率,70% 是国际市场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结果。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产生极大的冲击,是影响俄罗斯 2009 年与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的一个最为直接的重要因素。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使得世界各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降低,油气价格不断下挫。2009 年 2 月 6 日,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欧洲能源公司该年支付的天然气平均价格将从每千立方米 409 美元降至 280 美元,同时油价从每桶 147 美元降至 40 美元。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这对俄罗斯来说确实是致命的打击。这导致 2009 年俄罗斯 GDP 下降 7.8%。无论在 2009 年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还是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经济下滑幅度都是最大的。2013 年俄经济又陷入困境。据世界银行 2013 年 12 月 15 日发布的报告称,2013 年俄 GDP 增速为 1.3%。俄经济呈全面下行态势,处于低迷状态。出现这种状况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的一条是俄罗斯经济仍是能源经济,出口主要以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为主。由于欧元区经济疲软,全球液化天然气产能快速增加,再加上“页岩气革命”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市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降。据国际能源署 2013 年 11 月 12 日的报告,1~9 月石油均价为每桶 107.7 美元,比 2012 年同期下降 7.2%;11 月 1 日布伦特原油为每桶 95.14 美元;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俄天然气价格 2013 年 1~9 月比 2012 年同期下降了 3.9%。俄石油、天然气出口减少和价格下挫必然对俄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2013 年第一季度俄天然气出口量同比下降 60%,出口收入同比减少 58%,石油出口量下降虽仅为 0.38%,但由于油价下降,石油出口收入同比减少 54.5%。

上述分析说明,俄罗斯存在“荷兰病”现象,其经济过度依赖能源等原材料,因此,不可能保证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难以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

在分析能源对俄罗斯经济今后的影响时有一点是值得提出的:油价不大可能出现像 2009 年那样的大起大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油价可能保持在每桶 90 ~ 100 美元,因此,能源对俄罗斯经济今后的影响将会日益弱化。

十分明显,俄罗斯严重依赖能源等原材料出口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要摆脱这一状况,实现经济现代化既是俄罗斯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也是解决我们前面论述的影响俄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

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迫切性突出表现在:它在转变经济体制的同时未能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2009 年 9 月梅德韦杰夫在其博客撰写的《前进,俄罗斯!》一文中指出:“20 年激烈的改革也没有让我们的国家从熟悉的原料依赖中摆脱出来”。“简单地依靠原料出口来换取成品的习惯导致了经济长期的落后”。他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应不应该把初级的原材料经济……带到我们的未来”?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俄罗斯强调必须把经济现代化视为主要目标。2010 年 8 月 31 日《中国改革》杂志采访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他谈到经济现代化问题时说,对当今的俄罗斯来说,“现代化意味着一切”,“以现代化告别过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索罗金认为,对俄罗斯来说,今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实现现代化。

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主要问题是要着力解决由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

应该说,这次俄罗斯提出的现代化是一项战略性的决策。但实现上述战略性的转变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俄罗斯在实行由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时,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反复强调要从出口原料为主导的发展经济模式过渡到创新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发展能源等原材料部门对俄罗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并契合现实需要。设备陈旧、经济粗放型发展、竞争力差,这在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条件下,俄罗斯更感到这些问题的迫切性。索罗金指出:“俄罗斯主要工业设施严重老化,到目前至少落后发达国家 20 年,生产出的产品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机器制造业投资比重为 2% ~ 3%。同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存在技术差距。”最近他又指出:“如今俄罗斯机器制造企业中使用的技术设备服役超过 25 年,而整体来看所有经济实体部门的技术设备中有 80% 的服役时间已经达到 16 ~ 35 年,这就使得俄罗

斯不能生产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①为了优化经济结构,就需要大量增加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经济部门和高新技术部门的投资。目前,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对 GDP 的贡献率可达 50%,美国近 50 年来 GDP 的增长靠科技创新,主力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2009 年俄罗斯小企业对 GDP 的贡献率不超过 15%。从小企业的行业分布看,从事工业生产和科研创新的小企业仅略高于 10%,且呈逐年递减趋势。因此,可以看出,俄罗斯中小企业在未来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其作用仍然十分有限。

经济发展摆脱不了能源等原材料部门、创新型经济发展缓慢和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因素必然导致俄罗斯经济在相当长一个长时期内处于低速增长期。

李永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一)2013 年俄罗斯经济表现引起俄罗斯国内外专家热议

从目前情况看,2013 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 1.5%。俄前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说,2013 年下半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只有 1.3%~1.4%,2014 年经济增长也未必超过 2%,相对于 2013 年经济滞胀而言,这也是成绩了。

库德林在记者会上说,2014 年俄罗斯经济表现“可能接近 2%,也可能低于这个指标。而经济发展部的预测是 2.5%。”库德林认为,如果不包括金融危机时期,则近两年是 2000 年以来最坏的年份。这说明,原有的经济模式已经过时,而新的模式还没有发挥作用。他认为,俄罗斯目前处于滞胀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在 2014 年还将继续。

这种评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俄罗斯学者和主管经济的官员持这种看法,中国大多数学者也这样认为。俄罗斯作为新兴经济体,在进入 21 世纪后,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关注并得到积极评价。目前俄罗斯经济进程的表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二)俄经济似乎进入苏联经济的“怪圈”

这个现象值得关注,更值得探讨。如果俄罗斯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陷入低速增长状态,探其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学者指出,俄罗斯经济低速增长可能是周期问题。但是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不这么认为,她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不是周期问题,而

^① 德米特里·索罗金:《俄罗斯工业面临升级改造难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11 月 1 日。

是结构问题——生产率和竞争力低下。

通常认为,拉动经济增长有三个要素:投资、消费和出口。但是这个道理在俄罗斯不完全行得通。俄罗斯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对外经济环境的改善,即出口的拉动,而 2011 ~ 2012 年经济增长是依靠内需拉动的。2013 年内需的潜力已经耗尽。由于结构的缘故,继续刺激内部消费只能促进进口和加剧消费信贷泡沫,加剧通胀。而 2013 年俄罗斯经济的低速增长是在国际行情有利于俄罗斯的形势下发生的。这说明,出口拉动经济的潜力也已经耗尽。

这是否说明当前俄罗斯经济又陷入苏联经济的“怪圈”。苏联后期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高度垄断的经济结构以及国家财政对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高度依赖。但是那时苏联的机电产品还有东欧市场的支持,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加工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严重滞后,也就是说,现在的经济结构远不如苏联时期。苏联时期的高度垄断必然导致效率低下,这是任何垄断经济的共同特征,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腐败。

关于俄罗斯经济是否陷入苏联经济结构和体制的“怪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俄罗斯经济现象一样,需要继续观察和研究。

(三) 俄创新发展道路的前景

长期以来,俄罗斯学界和经济界一直讨论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对于传统经济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大家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改变现有发展模式的问题上,有比较大的争议。首先是如何对待以能源出口为主要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态度,其次是如何通过改变现有政治体制,通过公民社会和非垄断化实现经济彻底转型。对于创新发展的理解,俄罗斯学界和实业界是有分歧的,一种是在现有结构基础上的创新,一种是打破现有结构的创新。打破现有经济结构的创新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具有很大的政治阻力,俄罗斯未必走这样的道路。而在现有结构基础上的创新,最大的问题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这种性质。

当务之急,俄罗斯能够做什么? 目前,在俄罗斯只有投资可以拉动经济,而且必须是以结构改革为目的的长期投资。用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的话说,现在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投资,需要长期投资。而这种投资的前提是改变经济主体的预期,提高俄罗斯形势的可预测性,降低风险,抑制通胀。这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行政改革和反对腐败的政治问题。这样的改革总是艰难的。

(四) 经济低速增长的社会影响

俄罗斯经济低速增长的势头如果持续下去,将对社会政治形势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普京在竞选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承诺将没有实现的财政基础,从而将加剧社会不满情绪;其次,将影响欧亚联盟的发展速度,因为没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许多独联体范围内的多边合作项目无法实施;最后,将影响俄罗斯复兴和崛起的进程,从而影响俄罗斯作为复兴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

徐坡岭(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 年已经成为历史。预计 2013 年俄罗斯的 GDP 增长幅度不会超过 1.5%。从 2012 年第四季度开始,连续五个季度的低速增长预示着俄罗斯这个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陷入停滞。包括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预期都认为,这种经济停滞甚至具有长期性,直到 2020 年甚至 2030 年,俄罗斯的年均 GDP 增长率都无法超过 3.5%。尽管普京在 2013 年的年终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经济状况仍然是可控的和令人满意的,但显而易见,普京第三次步入克里姆林宫时的经济雄心由于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甚至停滞已经备受打击。因为他在 2012 年年底的总统竞选纲领中提出,俄罗斯要在 2020 年达到 GDP 比 2010 年翻一番,这需要年均 7% 以上而不是 1.5% 的 GDP 增长速度。

为什么俄罗斯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学术界有许多答案。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俄罗斯一直没有摆脱能源依赖。例如,IMF 预测俄罗斯 2013 年经济增长不超过 1.5%,给出的解释就是油价波动的周期性原因。一些进一步的解释也大抵如此,例如,“荷兰病”、“资源诅咒”等。有人甚至把俄罗斯的这种资源依赖型经济称为“俄罗斯病”。但以上这些解释都有些语焉不详或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本质。

首先,“荷兰病”的说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俄罗斯经济现象的某个侧面,但还无法揭示俄罗斯经济停滞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次问题。因为“荷兰病”发生的条件和机制在俄罗斯是可以被克服和抑制的,而且俄罗斯政府的确这么做了。

“荷兰病”是指一国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20 世纪 50 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天然气行业迅速发展,经济显现繁荣景象。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荷兰原本发达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严重衰退,并遭受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

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以及失业率增加的困扰。经济学家把荷兰在北海发现天然气后收入增加却导致制造业逐渐萎缩的经济现象称之为“荷兰病”。

“荷兰病”效应的发生机制在于：资源类初级产品部门的繁荣导致该部门投资回报率异常上升，挤出其他部门的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导致制造业部门生产成本上升。同时，初级产品出口增加提升本币汇率，削弱制造业部门竞争力，并阻滞技术创新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迟滞该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荷兰病”生成的经济原理在于：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资源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更高，从而引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向初级产品部门转移，导致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流入相对减少，并因此萎缩。在制造业部门存在递增规模报酬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分工却专业化于资源采掘业，从而损害了经济效率，短期资源收入的增加削弱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荷兰病”发生的最主要条件是小国开放经济。在小国开放经济条件下，某个初级产品部门的突然繁荣会对一国的汇率、产业间的资本回报率和产业间的要素供应产生巨大冲击。对照俄罗斯，一方面它是一个大国，某个部门或产业繁荣偶发冲击的影响不足以改变整个经济的进出口结构；另一方面，俄罗斯转型以来，特别是普京就任总统以来对卢布汇率的控制，对能源收入的使用（石油稳定基金）以及对通货膨胀的警惕，都是对“荷兰病”风险的防御。普京 2000 年就任总统之后，俄罗斯对资源部门的控制，对资源部门收益的管理，对石油美元在社会领域的使用以及石油稳定基金（后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能源部门繁荣抑制其他部门的发展。

其次，“资源诅咒”的确是俄罗斯的顽疾，但还不是当前俄罗斯经济问题的核心症结。“荷兰病”的发生机制实际上普遍存在于资源丰裕的国家，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奥蒂（1993 年）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1995 年）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丰裕国家的确更容易陷入经济增长困境，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资源诅咒”。他们揭示的“资源诅咒”在更宽泛意义上揭示了资源丰裕国家经济陷入困境的发生机制：第一，资源丰裕抑制竞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发生，社会劳动生产率进步缓慢；第二，资源丰裕的“荷兰病”效应；第三，丰裕自然资源引发的制度弱化^①；第四，丰裕资源收入使用不当导致的资金误配^②。

① 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经济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② 韩爽、徐坡岭：《自然资源是俄罗斯的诅咒还是福祉》，《东北亚论坛》2012 年第 1 期。

对照“荷兰病”和“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在从苏联解体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经济波动中,能源部门的兴衰及其对资源的挤占,对制度进化和竞争的阻滞,以及能源收入被误配到低效率经济部门或非经济用途部门等都曾经或正在发生。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确存在发生“荷兰病”的机制,也存在发生“资源诅咒”的可能性。但这还都是经济运行的客观机制,不是俄罗斯经济问题的全部实质。

最后,俄罗斯目前的经济问题具有历史性、政治性、社会性和结构性,是俄罗斯独有的,是“俄罗斯综合症”造就了俄罗斯的经济问题。这种“俄罗斯综合症”表现在:

第一,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短缺是俄罗斯的一种历史顽疾。俄罗斯历史上大肆扩张带来了疆界的扩展、自然资源的增加以及经济活动中心从莫斯科一隅向更广阔的空间转移,不断“稀释”着中心地带的发展。俄罗斯 1890 ~ 1903 年的第一次工业飞跃是法国和比利时资本慷慨流入的结果^①;苏联时期二战前的繁荣是计划体制集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果;二战后的繁荣是战后恢复和计划体制的推动。依靠市场机制让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几乎不曾发生在俄罗斯发生过。第二,经济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和国家强力介入是俄罗斯的历史宿命。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俄罗斯对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总是让经济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彼得大帝学习西方以及国家对实业的推动、斯大林对军事工业的投入、普京对资源部门的控制,都没有考虑让市场经济规律主导国家经济,斯托雷平和维特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反而成了例外。第三,“资源诅咒”的发生机制利用了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制度缺位,并进一步弱化了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结果,滋生“资源诅咒”病毒的四个机制都成了时刻准备涌动的暗流。

在“俄罗斯综合症”的作用下,我们看到,在国家的强力介入下,经济竞争受到资源部门经济垄断的抑制,制造业技术进步被资源部门的高回报率抑制,国家对资源的非经济目的使用和对低效率部门的补贴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制度弱化导致资本外流,制造业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使得制造业衰弱,并抑制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强化资本短缺和人力资本短缺这一历史顽疾,所有这些造就了俄罗斯今天的经济发展局面。

俄罗斯向创新经济的过渡需要在解决“俄罗斯综合症”上找到突破口。

^① M. M. 波斯坦等主编,王春法主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52 ~ 753 页。

赵传君(黑龙江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所谓“荷兰病”是指,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出口损害了本国其他有竞争力或有优势的出口行业,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很像“荷兰病”,但又不完全是。从GDP增长、外贸出口和财政收入对资源产品(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出口高度依赖的角度看,俄罗斯确实患有“荷兰病”,但俄罗斯的资源产品出口并没有损害其有竞争力或有优势产品的出口,因为俄罗斯的优势产品实在是寥寥可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军工产品、航空航天产品和核电设备。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2001~2008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年均在6%左右,所以资源性产品出口非但没有损害其经济增长,而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这两个基本事实又是俄罗斯患有“荷兰病”的悖论。俄罗斯目前经济低迷,甚至对2030年前的经济增长预测都不乐观(俄自己预测为2.5%),这既有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也有经济转型、投资环境和开放政策等因素的消极作用。我认为,俄罗斯经济患的是一种“综合症”,这种“综合症”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市场原因和政策原因。俄罗斯经济的希望和出路在于经济转型,早在2003年普京就已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明确提出“从资源依赖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的战略。然而10年过去了,俄罗斯经济转型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原因何在?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没有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俄罗斯政府部门官僚作风严重,各部门之间利益纠葛复杂,总统的战略方针不能在各个部门有效落实。各联邦主体都在为自身利益寻找出路,各地都想办法利用国家战略获得财政支持,而不是按总统思路去发展创新经济,追求的是短期效益。所以,虽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高度重视发展创新型经济,甚至也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和政策,但缺乏贯彻执行的体制保障。

二是缺乏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合作创新机制。经济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俄罗斯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多为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效率低下、垄断经营、利润丰厚、缺少创新动力,即使新建的六大超级国有集团公司也没搞出什么创新产品。而俄罗斯的民营企业没有形成规模,获得资金困难且成本较高,要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难度很大。原苏联时代就已存在的“军转民”和“产学研”结合问题至今也没有很好解决。俄罗斯不缺少高端技术和高端人才,但如何把高端技术和科研成果转化为有竞争力的创新产品,如何实现“产学研”的三位一体是一个瓶颈。

三是利用外资政策保守,投资环境较差。普京具有强烈的经济自主意识

和经济安全意识,希望把一些重要的行业都掌握在民族工业手里,特别是国有企业手里,划出 43 个战略行业,对外资进入这些行业规定了严格甚至苛刻的条件。俄罗斯在“入世”时在 11 个服务领域 116 个方面作出了开放市场的承诺,但能否真正落实还有待观察。近年来,虽然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不断呼吁请外商赴俄投资,但保守的利用外资政策和较差的投资环境使外商望而却步。1991 ~ 2001 年俄罗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只有 259 亿美元;2002 ~ 2011 年利用外资总额为 1 500 亿美元,年均为 150 亿美元。俄罗斯市场的投资潜力位居世界第 5 位,但利用外资的成效甚微,这也与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密切相关。目前,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在世界排名为第 120 位,普京呼吁要向前迈进 100 步,进入前 20 名,然而谈何容易。俄罗斯的经济自由度在世界排名第 143 位,在欧洲 43 个国家中排名第 41 位。我们说俄罗斯投资环境较差,具体表现为:(1)土地划拨程序复杂,费时长、成本高;(2)与市政各种管网接通比较困难;(3)融资困难,缺乏必要的政策担保;(4)对外资企业附加的就业条件比较苛刻;(5)与社会性缴费密切相关的税负较重;(6)缺乏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政府和商业的诚信度较低;(7)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到处都充斥着潜规则。

俄罗斯要摆脱“综合症”,要实现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的战略转型,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是通过改革探索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激活国有企业活力和创新动力,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用积累的财富向下激活产业发展,把资源开发与深度加工结合起来,使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创新的龙头。

二是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把俄罗斯的民营企业,尤其是深加工型和技术创新型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三是改变目前保守的利用外资政策和较差的投资环境,在俄罗斯所谓的战略产业中更多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一方面促进这些领域的竞争,另一方面借助外部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改善俄罗斯目前的产业结构。作为俄罗斯政府,应该做的主要是选择正确的产业政策、开放政策和改善投资环境。俄罗斯的企业惰性、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是俄罗斯的三大顽症,要真正解决需要系统和切实的改革措施。中国原来的经济结构与原苏联大同小异,经过 20 世纪 80 ~ 90 年代的经济改革和利用外资,经济结构有了显著改善,尤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卓有成效的利用外资密切相关。所以,俄罗斯应充分认识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转型的重要性。

刘军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任何一个经济体都跟人体一样会有小病小灾,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属于正常现象,通常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会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来尽可能把副作用降低。但对俄罗斯经济而言,其病症远远不只这么简单。俄罗斯虽然是怀着美好的愿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受困于各种复杂的内外部因素,不但扼腕断臂之后的先进性改良没有出现,反而进一步固化了原有的弊端和对资源出口的依赖性。那么这种资源出口依赖性从何时形成?是否属于我们所谓的“荷兰病”呢?

荷兰是个小国,原来的工业体系比较健全,是在发现石油之后资金的配置才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了其他工业领域的投资,推动了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并因石油美元的流入致使本币升值,进一步削弱了原来非石油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如果单纯比照这个狭义的“荷兰病”框架来判断俄罗斯的经济困境是否患上此病的话,那么我认为不是。

首先,俄罗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元凶并不是石油。俄罗斯的工业体系虽然健全,但相对而言,其轻工业比重工业的发展要落后很多,这“重重轻轻”的产业格局是当时按照国家战略进行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其实是跟轻工业发展息息相关,毕竟飞机大炮和枪支弹药是不能直接改善生活水准的。一言以蔽之,俄罗斯延续至今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最初并不是石油造成的。

其次,俄罗斯并不是突然发现石油之后才使投资集聚到这一领域。俄罗斯对石油的依赖性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西方国家而言,石油危机带来的是短暂的经济危机和持续的节能创新;对拉丁美洲国家而言,石油危机为其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对原苏联而言,石油危机推升石油价格之后带来的石油美元像是吸毒之后的快感,竟然导致俄从此对石油的出口收益欲罢不能,尽管俄罗斯国民从上到下都知道这种依赖性 is 致命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苏联石油的储量和产量就已经是相当多了,但对石油出口依赖性的显现和固化则是以石油危机为转折点。

再次,俄罗斯的石油美元并没有导致其本币持续升值,进而影响其他工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俄罗斯卢布的币值自转型以来一直不稳定,其中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不能完全归咎于石油出口。而俄罗斯非石油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除军火之外,一直在国际市场上并不显著,这显然也不是单纯石油惹的祸。

最后,“荷兰病”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在俄罗

斯都并不明显,即没有造成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没有使其因本币升值丧失竞争力。换句话说,俄罗斯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不是石油出口直接削减的。

即便如此,以上理由也只能比较牵强地解释俄罗斯的经济问题不是狭义的“荷兰病”。但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经济的确有病,最主要的症状是两个高度依赖:高度依赖外部信贷资金和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并由此造成了俄罗斯经济的高度脆弱性,使得其成为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摔得最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此,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给俄罗斯病冠以怎样的称谓,而是准确地判断病情、定位病灶、对症下药。

针对这一问题,普京提出了创新战略,但绝大多数人对这一战略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原因在于多数人认为,既然“躺着就能赚取巨额利润,谁还会去冒险搞创新”呢?对此,普京的应对措施是使国家重新掌控石油等战略性资源,制定中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成立主权财富基金,以期用行政手段配合市场机制将石油美元配置到创新型产业。这么做,普京所面临的内外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来自西方世界的批评以及“阿拉伯之春”的威胁可以说是需要非凡的定力和超人的政治智慧才能应付自如。此外,普京还希望通过高新技术特区来吸引外资,通过税收优惠和行政便利等手段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把纳米产业列为重点的突破领域。

中国也提出了创新转型的战略,但中俄两国在这一战略的实施上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差异。俄罗斯的优势在于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高、军工及航空航天技术先进、基础科学研究基础雄厚。而俄罗斯的相对劣势或者发展障碍则在于人口下降、劳动力资源缺乏。而这一劣势恰好可以通过实施创新型发展战略提高劳动效率加以弥补。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俄罗斯目前实施的创新战略其实也面临着诸多内外部挑战。就外部而言,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不会希望看到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俄罗斯,因此,将会千方百计地利用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等各种手段加以阻挠;就内部而言,创新是需要巨额资金的,如何让市场经济主体利用市场手段筹集资金进行研发对于投资环境尚欠佳的俄罗斯来说是不小的难题。俄罗斯要想使自己的创新战略得以成功,就必须想办法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丰富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金融深化,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降低融资成本,改善创业和投资环境,培育创业文化,保护知识产权,并借加入 WTO 之机加快与国际的接轨。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如何通过石油美元的积累来把资源禀赋优势培育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如果大家对俄罗斯没有信心,那么资本还是会外逃、外国直接投资还是不肯

进入到非资源的产业、人才还是会外流,这些状况不改变,创新对俄罗斯而言就只能是天方夜谭。

景维民 张 露(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荷兰病”是对一种宏观经济机制的理论描述,即经济体中自然资源价格的快速上涨会导致实际汇率上升,进而造成经济的相对“去工业化”。这一机制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反而在经济增长中表现较差^①,并对俄罗斯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经济结构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从“荷兰病”的经典表现来看,俄罗斯经济确有其病征:卢布持续升值、制造业增长缓慢(特别是排除与石油和天然气高度相关的产业后)、服务业份额增加、实际工资上涨,但我们认为,这些症状的出现并不完全由“荷兰病”所致,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荷兰病”在俄罗斯表现得并不严重。

一方面,从以上症状的成因来看,首先,经济的相对“去工业化”与俄罗斯的转型进程密切相关。苏联时期,在国家的支持和补贴下形成了一批竞争力低下的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量倒闭,同时,苏联时期受到人为压抑的服务业在转型后逐渐发展起来。与此相联系的产业结构演进能够部分地解释所观察到的相对“去工业化”现象。其次,相对“去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趋势。如同我们在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随着收入水平提高,需求逐渐从商品转向服务,制造业的服务外包行为也促成了服务业份额的上升。最后,实际工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与隐性工资在转型中的显现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关。因此,考虑到这些病征同时也是伴生于俄罗斯转型和发展的经济现象,我们在判断俄罗斯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时,需要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着遏制“荷兰病”发展的因素。第一,2000年以来,与出口繁荣引致收入大幅增长相伴随的是俄罗斯收入差距的明显扩大,这意味着在高收入阶层倾向于消费高质量进口产品的同时,其他阶层仍然保有大量对国内产品的需求。这种高速增长的同质性需求,使这一时期本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几乎与制造业商品进口的大幅增加同时发生,从而弱化了“荷兰病”所预示的进口替代现象。第二,得益于国家对天然气和电力的

^① 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和瓦纳(1995年)以及英国经济学家奥蒂(2001年)等人均对这一悖论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价格管制以及对原油和石油产品课以较重的出口关税,俄罗斯国内能源价格仅为国际市场价格的 $1/3 \sim 1/2$ (甚至更低),本国制造业能够从这种间接补贴中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第三,2000 年以来,俄罗斯中央银行为维持卢布名义币值稳定,凭借经常账户盈余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买美元,使得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从国际收支等式来看,这一行为抑制了进口增长,从而减轻了进口替代对俄罗斯制造业的重创。第四,“休克疗法”之后,1998 年的俄罗斯制造业平均仅相当于转型前的 40.7%,在较差的制度环境和相对低价的进口产品冲击下,俄罗斯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骤减,很多部门生产近乎崩溃。因此,当 21 世纪初卢布随油价上涨迅速升值时,俄罗斯制造业至少在一些部门已经处于相当糟糕的境地,从而缩小了“荷兰病”的发作空间。

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尽管俄罗斯尚未陷入严重的“荷兰病”中,但这并不代表俄罗斯可以放松对“荷兰病”的警惕。事实上,“荷兰病”能够通过设计并运行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被有效克服。如果自然资源所带来的财富能够通过稳定基金和审慎的财政政策被用于提升资源部门的生产率、加强上下游部门间的生产联系、促进出口多样化、对制造业和农业部门进行长期补贴、增加外汇储备避免本币升值,并削减税负、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对教育、基础设施、研发等事关长期增长能力的投资,那么,俄罗斯不仅不会为“荷兰病”所困,反而会在长期获得更加平衡、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2004 年石油稳定基金建立以来,俄罗斯已经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脚步,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政府失效”,应当说是自然资源给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和向创新型经济转变带来的最大难题。

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大量租金,会刺激政府和私人机构对这些资源展开争夺,促使腐败和寻租行为大量滋生,对改革和发展形成巨大阻力。而这些正是俄罗斯的现实遭遇。从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来看,俄罗斯在 165 个国家中排名第 121 位,并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腐败寻租活动的盛行,在经济发展方面,使生产性资源被大量用于非生产性活动,对生产投资、教育和研发创新造成挤出,从而大大削弱了经济长期增长的能力。与之相联系的商业环境恶化,也使俄罗斯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表现较差,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2013 年发布的转型报告,投资不足成为近期俄罗斯经济陷入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其所造成的国家俘获以及国家制度能力弱化,使俄罗斯难以通过严格实施的财政政策将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有计划地用于提升经济的多样性和自主创新能力,而倾向于固化高度依赖石油天然气部门的单一经济结构。长此以往,俄罗斯将难以避免“荷兰病”的困扰,形成制

制造业萎缩、服务业扩张的产业结构,一旦自然资源价格走低甚至面临枯竭^①,制造业将因知识和人力资本的长期退化而无力支撑俄罗斯经济,不可贸易的服务业也将迅速萎缩,从而使俄罗斯经济遭受巨大的打击。

可见,丰裕的自然资源不仅带来了“荷兰病”的威胁,还在更深的层面上加剧了俄罗斯的制度问题,能否处理好寻租、腐败、国家俘获等制度问题,是决定俄罗斯能否利用好自然资源这把“双刃剑”的关键所在。

程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研究员)

在讨论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什么是“荷兰病”,它有哪些基本特征。

在国际经济学界,“荷兰病”一词通常被用来形容某一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某一项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抑制了其他生产部门的发展,并最终导致这些生产部门衰落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荷兰油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尽管当时该国早已是重要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但是,为了迎合国际能源市场的旺盛需求,荷兰政府采取了错误的产业政策,大力发展油气工业,努力扩大石油、天然气出口,而忽视了对其他生产部门的投入。大量的油气出口确实给国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国际贸易顺差激增,进而刺激了国内消费,一时间国民经济一片繁荣。然而,繁荣景象下却孕育了一场危机,过度发展油气工业的后果是使本国的农业、加工业和制造业受到抑制和打击,削弱了它们的发展潜力和国际竞争力,工业制成品出口急剧萎缩。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当国际油气价格开始走低之时,能源出口给荷兰带来的利润大幅减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国内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居民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不断上升,国民经济陷入困难境地。

通过上面的简述我们可以看出,“荷兰病”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产业结构严重失衡,采掘业一枝独秀,其他生产部门受到削弱,工业制成品出口不振,经济增长停滞,同时伴有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从表象来看,俄罗斯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能源出口,产业结构失调,机电产品出口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具有“荷兰病”的部分特征。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并没有出现高通胀,不仅如此,通胀率还在逐年下降,近几年大体维持在6%上下。虽然绝对数依然很高,不

^① 英国石油公司近期的调查显示,以目前的开采速度,俄罗斯将在22年内耗尽其已探明储量。

过相对于持续了 20 年的两三位数的恶性通胀来说这已是个不小的进步。此外,俄罗斯的就业状况也在改善,失业率不断下降。因此,俄罗斯符合部分“荷兰病”的特征,但又不是典型的“荷兰病”。俄罗斯与荷兰完全属于不同的经济类型,二者之间差异巨大,上述消极现象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例如,造成俄罗斯产业结构单一化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能源工业异常繁荣,而在于“休克式”的经济转型,在那之后许多原本还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产业再也没有重新恢复起来。

从目前俄罗斯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不论它是否患上了“荷兰病”,但它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它的主要病征就在于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能源工业,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严重受制于国际能源市场,国家经济安全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其实,俄罗斯将发展能源工业作为自己的经济重点并没有错,丰富的油气资源是俄罗斯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没有理由不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使其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问题在于除了能源工业之外,俄罗斯还应完善自己的产业结构,避免经济结构的单一化,应当把能源出口带来的巨额利润用于发展现代产业,而不是仅仅设立一项储备基金用于救灾扶贫,还美其名曰“安全气囊”。虽然这个“气囊”的设立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但长期看,如果通过投资将其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竞争力将更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俄罗斯经济的出路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历史表明,医治俄罗斯的经济病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高层的政治决断和强有力的经济措施,同时还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配合。

田春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教授)

2013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低迷疲软,经济增速下滑。国内外学者在论述其经济下滑的原因时,再次对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予以关注并进行讨论。根据“荷兰病”的基本定义和俄罗斯学者的一些讨论,本文对这一问题略述浅见。

首先,“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一个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密切相关的经济术语。它通常指由于自然资源大量出口,导致该国的汇率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工业品出口减少、国内制造业衰退的现象。实际上,学者们通常以“荷兰病”来阐述一国经济对资源出口的高度依赖,从而警示该国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21 世纪以来,俄罗斯经济进入

恢复性的增长和发展时期,同时国际油价也迅速攀升,俄经济增长与国际油价攀升的同步性,显示出俄罗斯对能源出口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近年来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及相关行业的产值大约占俄预算收入的70%和国内生产总值的40%。因此,俄政府通常根据乌拉尔牌石油的平均价格预测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可见,俄能源不失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能源资源也是俄罗斯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由于能源及其相关产业在俄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将俄罗斯经济视为一种能源型经济的国内外学者不在少数。

其次,俄罗斯能源型经济的程度和影响。对于俄能源型经济以及被认为的“荷兰病”的认定,俄罗斯国内各界的评论不尽相同。核心问题在于,人们对于所谓“荷兰病”对俄经济的影响程度评价不一。按照俄罗斯财政部官员阿列克谢·莫伊谢耶夫的说法,由于俄罗斯政府采取的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荷兰病”在俄罗斯的影响是有限的,不必对其过程和结果担忧。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经济不能确诊为“荷兰病”,但是该病的一些症状是不可否认的。还有学者指出,从“荷兰病”的学术角度看,由该症状对俄罗斯经济引发的其他疾病,诸如垄断等,都是从苏联时期继承而来,而不是俄罗斯时期才有。

再次,俄罗斯能源型经济与学术定义的“荷兰病”存在着差异。从俄经济的实际看,俄罗斯的能源型经济与“荷兰病”症状具有相似性。表现为:第一,俄经济中能源(原油和天然气)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高,目前约占40%。第二,俄逐年增加的能源出口导致卢布汇率升值与波动。数据显示,2003年1月俄石油出口价格的上涨支持了俄卢布升值,但在2008年后,石油价格的急剧下跌也对应着卢布的贬值。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卢布的实际汇率大约上升2.43倍,能源出口和卢布汇率波动使通货膨胀率多年来居高不下,因此,俄中央银行决定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将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俄制定货币政策的框架。第三,俄罗斯国内的资本、劳动力和相关产业向能源产业和资源型国有企业集聚,在俄罗斯经济中所占比重比其他制造业产业所占比重重要高得多。

俄罗斯能源型经济与“荷兰病”也有非相似性,即差异性。表现在:第一,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发展及其石油、天然气的大量出口,并没有导致俄罗斯工业制造业部门的“去工业化”。俄能源出口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加工业的发展,例如,汽车装配业等;同时,俄罗斯的非能源行业在海外市场也存在,并创造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俄制造业、工程业和武器

装备等的生产与出口。不可否认,俄能源产业的出口赢利效应对其国内不可贸易部门和产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正如有学者所言,俄制造业部门的“相对去工业化”在一定程度存在,但这不能归结于能源出口的单一因素影响。第二,俄政府能够高度掌控能源租金的使用和去向。早在 2004 年,俄决定将石油出口的超额收入积累起来建立石油稳定基金,2008 年 2 月,俄又决定将石油稳定基金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储备基金用途是在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国家收入减少时用于补充财政收入以及偿还国家外债;国家福利基金的用途是补充国家退休基金的不足。第三,从外国资本流动及其对俄投资规模的影响看,外国资本并没有随着俄能源出口而大量流入俄罗斯,外国投资在俄经济中所占比重一直比较低。

总之,俄罗斯作为世界上地大物博和资源丰裕的大国,能源型经济可看做俄罗斯经济现阶段特有的经济特性。由于俄罗斯与荷兰所处的国情、时代、表现及其结果的差异,不宜将目前俄罗斯的能源型经济与 20 世纪中叶荷兰小国的“荷兰病”相提并论。而且,俄罗斯高层和经济主管部门对于其能源型经济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知,也在努力实现创新经济和经济现代化,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俄罗斯经济看,短期内,俄经济很难摆脱对能源出口的依赖;从较长期趋势看,俄罗斯经济正在努力推进转型、改革与结构调整。但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如果俄罗斯能够在创新经济方面找到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俄罗斯经济的能源化构成将会大大改善。

曲文轶(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俄罗斯经济到底是患有“荷兰病”还是患有“俄罗斯病”

“荷兰病”是对资源富裕型国家经济增长困境的一种概括,基本含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出口带来其他部门竞争力下降,最终导致经济恶化。“荷兰病”的表现一般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制造业萎缩,这既可能是资源转移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外汇收入大幅上升导致本币升值,进而降低了制造业竞争力,并且收入效应导致可贸易的产品进口上升,进一步损害本国制造业发展;服务业因其非贸易性而可能得益于收入效应而发展,从而导致结构退化。二是增长崩溃。即使最初由资源出口带动了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却难以为继,反而因结构退化而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崩溃。如果放置更长的时间维度考察,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和华纳(1995 年)等人发现,二战以后较长时期里(20 世纪 60~90 年代),一些资源富足的发展中国家与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其经济表现明显不令人

满意。

判断一国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应主要观察其中长期的增长和结构特性。

对于俄罗斯“荷兰病”的质疑，源起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增长阶段，背景是普京接替叶利钦执政后，俄罗斯经济摆脱了此前连续十年的衰退，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其国力也随之迅速恢复；另一方面，在高速增长以及油气经济之外，其他经济指标却乏善可陈，尤其是出口严重依赖油气等初级产品，而高技术的机器设备则大量依赖进口。

但俄罗斯的结构性问题与“荷兰病”并非严格一致，因其加工制造业并未陷入衰退，相反，伴随油气资源的大规模出口国内制造业也在增长，有些年份其增速甚至高于油气等初级产品部门（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资料，2003 ~ 2008 年俄采矿业实际增长率年均均为 3.4%，而加工业则为 5.6%）。产业结构也并未出现恶化，原因除了加工制造业的增长外，还在于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采矿业占 GDP 的比重从 2002 年的 7.1% 降至 2008 年的 6.9%，而加工业则从 26.1% 升至 27.5%）。

俄罗斯的结构退化主要显现在出口部门，即制成品所占比重提升缓慢，而油气等资源性商品所占比重却显著提高，甚至占到了 7 成以上。更为关键的指标，是加工业中高技术的机器设备生产的所占比重过低，例如，2007 年俄罗斯为 20.8%，而其他国家 2004 年或 2005 年的相应数字为：德国为 43.8%，日本为 47%，美国为 34.4%，中国为 37.9%。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先是遭遇生产骤降，2009 年 GDP 下降 7.8%，继而又很快恢复了生产，2010 ~ 2012 年年均增速为 3.8%，截至 2012 年年底，GDP 已经恢复至 2008 年水平的 103.6%，与西方七个工业化国家的 102.2% 相比，表现尚可。因此，危机以后，“荷兰病”问题已经不再是关注俄罗斯经济的热点，世界经济低迷背景下的周期性问题及其调整则成为讨论的重点。

尽管俄罗斯的油气经济问题与“荷兰病”并不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2000 年以来油气依赖型发展模式具有显著弊端：国内经济发展受制于外部市场而频繁波动，尤其是在世界经济低迷时，国内经济便会受到实质威胁。这也是普京 2012 年重返克里姆林宫前在其竞选纲领中着力强调要改变油气依赖实现创新发展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俄罗斯问题的实质是国内经济易受外部经济影响而出现频繁波动。日本学者久保庭真彰（2012 年）使用“俄罗斯病”一词概括俄罗斯资源

依赖型经济对于油价的过度反应现象。尽管与“荷兰病”一般意义上强调制造业萎缩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注意到了对自然资源出口依赖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是有症状但没发作,还是处在“半荷兰病”状态

2013 年,俄罗斯经济在连续 3 年的恢复性增长后,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趋势,据预测,全年 GDP 只增长 1.3%。与之相比较,IMF 预测西方七个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为 1.2%,世界平均水平为 2.9%,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 4.5%。IMF 的中期预测(截至 2018 年)也显示,俄罗斯 GDP 增速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比发达国家高 1 个百分点左右。那么,糟糕的经济表现能否归结于“荷兰病”的发作?

前面提及,“荷兰病”的症状或曰发作表现主要为制造业萎缩以及增长崩溃,尽管俄罗斯 2013 年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但在全球背景下并非很差,更为重要的是,在增长放缓的同时结构并未恶化。2013 年前三个季度俄罗斯采矿业生产下降 1.1 个百分点,加工业增长 0.2 个百分点,2012 年同期加工业的增长指标(3.1%)也好于采矿业(1.2%)。出口方面 2013 年 1~10 月整体下降 0.7%,其中燃料能源商品下降 0.1%,而机器设备出口则微弱增长 2.9%,2012 年同期机器设备出口增长幅度同样高于燃料能源商品的出口增速(二者分别为 7.8% 和 3%),机器设备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从 2012 年的 4.9% 升至 2013 年的 5%。

因此,尽管俄罗斯经济总体增长趋于停滞,但路径上与“荷兰病”机理相悖,并非资源大规模出口致加工业萎缩而产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拖累恐怕是主要原因。

(三)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和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难点以及医治“荷兰病”的药方

尽管用“荷兰病”概括俄罗斯经济问题并不准确,但不可否认,其对油气等自然资源的依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频繁波动是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因此,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并使其向创新型增长转变,这一点已经成为俄国内共识。事实上,早在 2003 年普京第二任期开始前俄政府即已提出结构调整与创新发展问题,迄今 10 年有余却未有根本进展,这才是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

俄罗斯结构调整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在于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2012 年俄罗斯人均 GDP 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27 万美元与美、日、欧的 4 万~5 万美元尚存很大差距,但却远远高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这决定了俄

罗斯的分工困境:总体上,无论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俄罗斯都不具有竞争优势。其次是政策困境。为加快向创新经济转变,有必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使油气收入更多投向创新活动。全球范围内,只有东亚“发展型国家”在西方世界之外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产业升级。但俄罗斯经济精英却不愿仿效发展型政府政策,认为政府作用主要在于完善市场环境,即主张走后工业发展道路。在这种舆论导向之下,大量的油气收入被投入民生工程,用于经济建设的投入却相对很少。另一方面,俄政府也认识到了消极无为的弊端,从普京第二任期开始加大政府干预力度,方向却是依赖国有企业和财政拨款,但囿于国家治理的低效,结构调整成效不彰。

既然俄罗斯经济结构性问题长期存在,治疗就不可能有特效药,但努力方向还是可以辨认的。首先是需要明确国际分工定位,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确发展战略。俄罗斯除了异常丰裕的自然资源,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可行的突破点是一些特定领域的高科技(包括军工、核能、航天等传统上具有一定优势的高科技产业),以及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加工。俄政府对于前者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现代化战略,确定的重点发展领域都是极少数俄罗斯目前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对于资源性产业的认知则需要进一步清晰化。俄官方一方面将资源的高效利用作为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另一方面,总是强调不愿做“原料附庸”,结果是社会舆论对于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偏见以及政策对于资源开采利用,尤其是外资参与的诸多限制。事实上,唯有利用资源禀赋才能为结构调整筹集必要的资金,并且无论是资源的开采还是深加工都可以成为创新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有效载体,因此,应该改变现有的资源政策,积极鼓励资本包括外国资金和技术进入。至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轻工业,长期以来俄罗斯都无法与发展中国家竞争,所以,明智的选择是对其进口贸易自由化,而非刻意刁难贸易,尤其是严格限制外国商品零售环节而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

无论是发展高科技还是高效资源性产业,都需要政府主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国有企业的垄断来实施。为提高干预效率并降低由此带来的腐败,提高透明度和增强决策民主,放松管制、治理腐败都是必要的,也是普京在新任期提出的任务。但在这些传统的改善制度环境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实行更为积极进取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倾斜生产(向特定地域和特定产业)的特惠手段,诸如税收减免、土地免费供应甚至是对官员的GDP考核等(这里指的是中国的经验)。普京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建立西伯利亚和远东超前经济发展区是个突破。

马蔚云(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荷兰病”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从前者来看,“荷兰病”是指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一种悖论。从后者来看,“荷兰病”是指随着一国能源原材料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本币汇率持续升值,通货膨胀难以抑制,非能源资源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下降。在实践中,资源丰富的国家同 20 世纪 60 年代的荷兰情况不尽相同,而且衡量“荷兰病”的具体指标也难以全部量化,所以,经济学家常常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指标,对一国是否患有“荷兰病”作出广义解释,以此警示经济发展对丰富资源的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1992 年转型以来,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严重危机(1992 ~ 1998 年)、快速上升(1999 ~ 2008 年)、增长乏力(2009 ~ 2013 年)三个阶段,其中 2009 年经济下降 7.8%,在世界大国中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大。近几年,俄罗斯经济呈现明显的“功效递减”趋势:2010 年 GDP 增长 4.5%,2011 年增长 4.3%,2012 年增长 3.4%。世界银行预测,俄罗斯经济 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增长 1.3% 和 2.2%,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为 1.4% 和 2.5%。显然,俄罗斯出现了经济学上的“荷兰病”现象,其根源是经济结构存在问题。俄罗斯经济结构从 1992 年转型以来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如市场经济改革冲垮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封闭型经济结构向开放型经济结构转变等。然而,俄罗斯经济结构在取得上述进展的同时,经济结构畸形的非均衡状态并未得到彻底改变。

其一,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的重点并不应该是固定的,在一定时期倾斜于工业和重工业,在下一个时期就应适度地转向农业和轻工业。俄罗斯长期以来将资源倾斜配置的取向固化,造成比例失调和结构失衡。现行的产业结构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突出表现在能源原材料工业的产值比重异常高(2005 年占 GDP 的 14.2%,2012 年占 14%),大大超出世界发达国家水平(2000 年为 7.6%),而农业、轻工业等部门的产值比重(2005 年和 2012 年农业分别为 6.4% 和 5.1%,轻工业不足 1%)仍具有典型的低收入国家的特征。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虽然较高且呈上升趋势(2005 年占 38.1%,2012 年占 40.6%),但主要是消费型服务业发展较快,而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滞后,不能得出三次产业结构出现明显优化的结论。在这种结构不均衡基础上推动的经济发展必然是非均衡的过程。

其二,市场商品结构矛盾比较突出。俄罗斯经济已从供不应求的短缺型经济转向过剩型经济,因为市场功能基本符合哈耶克所说的消费者主权和科

尔奈提出的需求约束。然而,通过对俄罗斯市场的分析发现,现有的买方市场是结构性的,实际上存在许多卖方市场。因为在买方与卖方的竞争中,买方占优势,只能用生产能力概念来解释。在俄罗斯消费市场中进入买方市场的产业的技术等级过低,买方市场是在生产能力不足而不是过剩的条件下形成的。例如,不含酒精饮料的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 2010 年只有 46%,2011 年降为 40%;亚麻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 2010 年和 2011 年均为 20%。

其三,外贸出口产品结构单一。由于俄罗斯能源原材料资源丰富,国外市场需求旺盛,加之受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特性的驱使,从事能源原材料出口的企业开始扩大生产规模。以原油为例,1999 年开采 3.05 亿吨,2012 年开采 5.17 亿吨,14 年间增长了 87%。国外对俄罗斯原油的进口需求弹性增大为俄罗斯产品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原油出口保持增长势头:1999 年出口 1.348 亿吨,2012 年出口 2.4 亿吨,14 年间增长了 78%。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俄罗斯出口结构比较单一,燃料能源占出口的一半,石油出口提供了国家 1/3 的外汇收入,能源产品出口强劲对活跃经济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在充分肯定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必须指出,外部市场行情的变化容易引起俄罗斯经济的波动。

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委内瑞拉等,都出现了“荷兰病”现象。俄罗斯国内普遍担心患上“荷兰病”,但也有专家认为,“荷兰病”不是所有资源丰裕国家的一种必然现象。即使“荷兰病”来临,只要措施得力,也能很好预防。例如,20 世纪 70~80 年代澳大利亚、英国和挪威都出现了类似的经济症状。澳大利亚的采矿业、英国和挪威北海的石油开采业,都出现过“荷兰病”。后来,澳大利亚通过充分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优势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移民,英国和挪威为世界供应开采技术和设备,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俄罗斯应当借鉴它们的先进经验,发挥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2008 年 2 月 8 日,普京在《2020 年前俄罗斯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俄罗斯将由资源依赖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发展,既要重视经济领域中量的变化,更要追求质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2012 年普京再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后,重申了上述观点。2012~2020 年是俄罗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从而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尽管俄罗斯国内普遍认识到,过度依赖能源部门已经和将要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危害,然而,对于处于“追赶”发展阶段的俄罗斯而言,历史上的重工业化优先发展论仍将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加之俄罗斯谋求恢复大国地位的愿望十分

迫切,而对外强硬战略的实施必须倚重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现有经济尤其是比较优势明显的偏重能源原材料工业的产业结构具有的“超稳定性”特点短期内难以根本改观。这种偏重能源原材料的经济结构是俄罗斯无法避免的一个发展阶段,有其必然性,在俄罗斯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会继续存在,这是俄罗斯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王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近年来,俄罗斯资源型经济所带动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也引起了关于这种经济模式弊端的讨论,认为俄罗斯经济带有“荷兰病”特征的观点可谓甚嚣尘上,同时也存在着大量反论。因此,有必要对这种经济模式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荷兰病”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登和尼瑞对荷兰经济进行分析后发现,由于天然气大量出口,导致荷兰国内工资水平上涨,同时抬高了汇率,导致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萎缩,国民经济陷入对资源开采和出口的强烈依赖。按照这种逻辑,似乎俄罗斯具有与荷兰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同样是资源型产品的大量出口,经济对资源的依赖度也相当高。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俄罗斯也患有“荷兰病”?近年来,俄罗斯经济所出现的增速下降,是否可以直接套用“荷兰病”的模式来进行界定?这需要透过两国的共性更加具体地分析两国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

首先,“荷兰病”具有典型的小国经济特征,因此,资源的大量出口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而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虽然能源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所造成的弊端与“荷兰病”相去甚远。

其次,“荷兰病”的根本在于天然气过度出口,虽然荷兰拥有与英国共同投资的壳牌石油公司,但荷兰的石油资源并不丰富,“荷兰病”的起因与影响主要在于天然气。俄罗斯在能源发展方面则是典型的两条腿走路,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产量、出口量都位居世界前列。与石油相比,天然气在运输条件上所受限制更大,由于只能采取管道运输的方式,因此容易形成出口中的固定格局,一旦价格调整,必然会冲击整个国民经济。石油的优势在于,运输条件多元化,更容易扩大出口覆盖面,以避免偶然事件对能源产业的冲击。更为关键的是,当今世界能源中,天然气的战略地位远低于石油,俄罗斯作为两种能源出口国的主动性自然要好于当初仅出口天然气的荷兰。

再次,如果说荷兰资源型经济对制造业的出口部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那么对于俄罗斯则不能这样简单判断。毕竟,俄罗斯是从转型初期筚路蓝缕

般的混乱中走出,制造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衰退,并非单纯由于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所造成的竞争劣势。

最后,“荷兰病”起源于第二次石油危机,加之国内突然发现大规模天然气田,此后天然气的价格攀升,造就了 20 世纪 70 年代荷兰一夜暴富式的发展模式。而俄罗斯资源型经济的发展则起源于新千年以来国际油价的逐步攀升,油气出口使俄罗斯提前偿还了外债、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组建了稳定基金(后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给俄罗斯曾经艰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综合以上因素,“荷兰病”与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很难构建非常准确而直接的联系,只能作为一种启示或借鉴,为分析俄罗斯经济特征提供参考,因此,将俄罗斯当前所遭遇的经济困境称之为“俄罗斯病”或许更加合理。当然,荷兰当初所采取的冻结国内工资水平、企业承诺不裁减雇员等方式来治愈“荷兰病”的办法,在当今的俄罗斯也很难直接采用,因为其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荷兰病”。

应当说,俄罗斯高层早就对国民经济过度依赖能源这种弊端有所重视,普京所提出的“创新型经济”和梅德韦杰夫提出的“现代化战略”都是有针对性的良好举措,问题在于能否将这些举措在俄罗斯经济中付诸于实践,并取得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显然,不能寄希望于主动抑制能源产业的发展而改变国民经济结构,而应当在制造业中寻求增量发展的办法,利用能源出口所奠定的外汇和资金优势,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用渐进式的办法解决俄罗斯当前所遇到的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荷兰病”,还是“俄罗斯病”,其中的核心和关键都在于能否将资源出口所获得的外汇收入善加利用,如果能够有效引导到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基础设施、教育投资中,能源出口就能够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则会起到负面影响。在俄罗斯国内,早已有很多学者提出将以能源出口获得的外汇直接用于基础性投资,以改善国民经济结构的办法。在现实中,俄罗斯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是通过组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积累外汇,再进行社会性投资的间接措施。稳定基金拆分后,储备基金定位于宏观经济层面,国家福利基金则定位于长期社会发展层面,后者的投资性定位已经非常明确。

因此,当前俄罗斯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方案必然是如何利用资源型经济的问题,而不是是否继续发展能源产业的问题。尽管当前俄罗斯经济增长受到限制,但不能以限制能源产业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而是应

当利用能源产业积累的资金,将其引导到制造业部门,外汇收入则用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以此来获得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而不能用“荷兰病”模式简单套用在俄罗斯身上,简单机械提出治标不治本的治愈方案。

高际香(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一) 俄罗斯国内和国际机构有关“荷兰病”的提法和主要观点

俄罗斯官方有关“荷兰病”的提法始于 2000 年。时任经济发展部部长Г. 格列夫在对国家杜马作报告时指出,俄罗斯经济有可能患“荷兰病”。自此,俄罗斯经济学家中有关“荷兰病”的讨论不绝于耳。2005 年,标准普尔在所有评级机构中率先提出,俄罗斯经济已患“荷兰病”。

2013 年,俄罗斯有关“荷兰病”的讨论有两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在 2013 年 1 月中旬,盖达尔读书会框架内举办了题为“俄罗斯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上就“荷兰病”进行了小组讨论。讨论的主题为:避免“荷兰病”:如何更好地管理能源收入。全俄社会组织“实业俄罗斯”执行主席安·丹尼洛夫-丹尼良认为,因卢布汇率被牢牢操控,1998 年之前俄罗斯不存在“荷兰病”。1998 年卢布开始贬值,一直持续到 2003 年,该阶段也不存在“荷兰病”。2003~2008 年上半年虽然卢布大幅升值,但通胀率和失业率均下降,而且加工工业部门、机械制造业部门呈现增长态势,军品出口甚至增加。由此可以断言,俄罗斯经济并未呈现“荷兰病”症状。俄罗斯加工工业部门并未因资源产品出口价格上涨而休克,主要原因是资源产品出口收入流入了加工工业部门,促进了加工工业部门的发展。当然,俄罗斯经济患“荷兰病”的风险不应低估。一是今后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不会大幅上涨,二是巨额出口收入的无效利用可能产生风险。经济专家组组长 E. 古尔维奇则认为,俄罗斯经济虽然没患“荷兰病”,但是有“荷兰病”的征兆。参加讨论的专家一致认为,避免“荷兰病”的最好方法是推进结构改革、致力于制度和技术创新、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积极发展加工工业、以提供国家担保的方式鼓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以及充实国家福利基金用于教育、医疗发展。

第二个高潮是 2013 年 7 月 17 日《公报》登载了高等经济学院发展中心 B. 米罗诺夫的文章,题目是《俄罗斯得了什么病?》文章认为,加工工业落后(近 10 年来加工工业部门劳动力年均流失 3.3%)、卢布升值(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04~2013 年 5 月,按实际有效汇率计算,卢布升值 58%)、成本上升(单位劳动力成本和能耗已接近 1998 年和 2008 年危机前的水平)和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发展时期支出增加,在发展停滞时减少支出)是

“荷兰病”的主要特征。随后,俄财政部副部长 A. 马伊谢耶夫表态,认为俄罗斯经济中的“荷兰病”确实存在,但在可控范围之内。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措施状况会恶化。

(二)对俄罗斯经济是否患“荷兰病”的看法

综上所述,俄罗斯学界乃至政界对“荷兰病”的探讨并非简单停留在是与否的问题上,而更多的是采取何种措施避免“荷兰病”的发生或者避免病入膏肓。

综合各家之言,基本判断是资源型经济未必一定会陷入“资源诅咒”的怪圈,俄罗斯经济确实存在患“荷兰病”的潜在风险,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但效果如何,将取决于诸多因素。原因阐述如下:

首先,资源型经济不一定会陷入“资源诅咒”的怪圈,也可能是自然的恩赐。从200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资源型经济使俄罗斯受益匪浅,特别是民生状况大为改观。2000~2010年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为9.6%,远远超过GDP年均5.3%的增幅^①。贫困率从2000年的29%降至2011年的12.8%。退休金水平明显提高:2012年与2002年相比,名义平均退休金实际增加了1.8倍,退休金与最低生活保障线之比从1.084倍增至1.798倍,养老金替代率从34%增至36.8%^②。

其次,资源型经济有产生“荷兰病”的潜在风险,但假设前提是经济体陶醉于资源优势而不自知,从而产生“温水煮青蛙”效应,而俄罗斯实际上清醒地认识到了潜在风险,并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一是2004年俄罗斯将石油出口超额收入积累起来建立稳定基金,并于2008年将其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储备基金用于补贴财政开支不足和偿还国家外债,国家福利基金则用于补贴养老金。二是在汇率政策上,以实际有效汇率走廊为调节区间,通过外汇市场操作维系外汇走廊,确保卢布实际有效汇率稳定。三是为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领域尝试实行通胀目标制。四是力促创新。2000年以来,俄罗斯致力于创新政策工具的建立和完善,2011年批准了《2020年前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2014年7月将成立联邦知识产权局,2014年年底前知识产权发展新战略将完成。在实践层面上,2012年俄罗斯

^① Федорова Л. К. вопросу о действенност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 Экономист. 2013. №4. С. 62.

^② 引自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2013年4月向国家杜马所作的《2012年俄罗斯政府报告》。

创新投入已进入欧洲前五名,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正在大规模建设中。五是强化民生政策,为实现创新发展培育人力资本。2006 年开始实施教育、医疗、住房和农工综合体发展国家优先项目。社会政策支出持续增加,2008 年社会政策支出在各级预算支出中占 26.6%,到 2010 年已达 34%,2011 年和 2012 年仍维持在 32.5% 的水平^①。

最后,应对措施是否奏效取决于诸多因素。从国际经验看,挪威应对“荷兰病”的方法一是国家干预经济,二是创建稳定基金,三是抑制通货膨胀。英国治愈“荷兰病”的方式是严格控制对外经济活动,稳定英镑汇率,并寻找新的销售市场。两个国家的政策措施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俄罗斯预防“荷兰病”的政策措施能否奏效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际市场资源产品的价格高位还能维持多久,二是国家福利基金和储备基金(截至 2013 年 12 月初,国家福利基金为 GDP 的 4.4%,储备基金为 4.3%^②)的使用方式和效率。第一个因素决定俄罗斯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众所周知,技术创新难以一蹴而就,经济结构调整亦非朝夕可为,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预估,创新经济效应在 5~6 年之后方可显现。第二个因素决定能源收入的投向,并最终决定资金使用效率。近期,俄罗斯意欲扩宽国家福利基金使用方向,计划动用部分国家福利基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但效果如何,需拭目以待。

郭晓琼(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一) 理论模型

“荷兰病”模型具有以下四个假设:(1)一国的经济被抽象为三部门,包括能源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2)三部门之间的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可自由流动;(3)能源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为可贸易部门,在全球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其价格决定是外生的;(4)服务业部门为非可贸易部门,其价

^① Горина 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расходы и приоритет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оссии. Доклад на семинаре Центра " Методика и анализ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расходов на социальную защиту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уровень" в мае 2013 г.

^② http://www.minfin.ru/ru/nationalwealthfund/statistics/volume/index.php?id_4=6412; http://www.minfin.ru/ru/reservefund/statistics/volume/index.php?id_4=5796

格决定是内生的^①。

“荷兰病”模型中,石油价格上涨的效应包括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石油价格的增长带来石油部门劳动力和资本需求的增大,引起该部门工资的上涨和资本回报的增加。资源转移效应引致劳动力和资本从制造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流向能源部门,能源部门的产出和劳动力雇佣将因此而增加,而制造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产出和劳动力雇佣将会减少,这导致“直接去工业化”。对于服务业而言,由于价格由本国供求决定,产出下降导致价格上升;对于制造业和能源部门而言,其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外生决定的。三部门价格变动的综合结果是,不可贸易商品相对于可贸易商品价格上涨,引起本币升值。

石油上涨的支出效应与能源部门雇佣劳动力无关。支出效应是因为高油价提高了能源部门的工资和收益,导致了总需求的增加。某种程度上,一部分需求转移到国内服务业,服务业价格将会上涨,而能源和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是外生决定的。这又会使汇率上升,本币升值。本币升值导致可贸易部门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这将引起产出和要素需求的下降。对于制造业部门而言,这一效应被称之为“间接去工业化”^②。

综合以上两种效应,“荷兰病”表现为以下四种症状:

第一,石油价格上涨导致服务业价格相对上升,引起汇率上升;第二,制造业产出和劳动力需求出现明显下降,表现为直接和间接的“去工业化”;第三,综合效应下,能源部门和服务部门产出和劳动力变化并不明确,因为在这两个部门中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的作用力相反;第四,如果劳动力可自由流动,工资全面上涨。

(二)对俄罗斯是否患有“荷兰病”进行检验

第一,检验油价上涨是否导致卢布升值。根据乌拉尔牌石油价格和历年来卢布对美元汇率的数据,2003年1月至2008年7月,石油价格的上涨对应着卢布的持续升值,2008年7月至2009年,石油价格的急剧下跌则对应着卢布的贬值。然而,汇率的涨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得出油价上升导致汇率上升的结论。因此,考虑到其他因素,使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模型对俄罗斯汇率变动的原因进行解释。在油价、外汇储备等因素

^① Nienke Oomes, Katerina Kalcheva, IMF Working Paper, Diagnosing Dutch Disease: Does Russia Have the Symptoms? April 2007, WP/07/102.

^② Corden W. M. and Neary J. P., 1982, 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92, pp. 825 – 848.

中,汇率与油价的关系为负相关,表示油价的上升导致汇率下降,由于采用直接标价法,这意味着油价上升导致卢布升值;而外汇储备与汇率的关系为正相关,这意味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起到了抑制卢布升值的作用。因此,验证了俄罗斯经济具有油价上涨导致卢布升值的特征。

第二,检验制造业部门是否具有“去工业化”的表现。在能源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各部门产出的年度数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价格平减,得出各部门产出的实际增长率。从三部门产出的实际增长率看,制造业部门除在 1998 年出现负增长之外,其余年度增长率均为正,这表明俄罗斯制造业没有出现“直接去工业化”。然而,将制造业部门与能源部门的实际增长率相对比,可以发现,在油价上涨的年份中,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增长率均低于石油部门(如 2004 年制造业实际增长率为 2.5%,而石油部门为 7.3%,危机过后的 2010 年制造业增长 3.76%,石油部门增长 7.95%),而在油价下跌的年份(2005 年、2007 年、2009 年)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增长率则高于石油部门(如 2009 年,制造业部门实际增长 -21.1%,而石油部门实际增长 -40.7%)。此外,在油价上涨的年份,服务业部门的实际产出增长率也高于制造业部门,有时甚至高于能源部门。这说明俄罗斯出现了“间接去工业化”现象,同时,综合两种效应,俄罗斯的支出效应要大于资源转移效应。从三部门的就业人数看,2000 年之后,制造业部门就业人数一直呈现负增长趋势,与 2000 年相比,2011 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 16.4%。燃料部门就业人数在各个年份有增有减,从总体看,与 2000 年相比,2011 年燃料部门就业人数下降了 4.3%。因此,可以说俄罗斯出现了“间接去工业化”现象。

第三,检验是否存在工资上涨效应。2000 年之后,三部门的实际工资都出现了快速增长(增长率为正),这与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都相符。最初能源部门工资增长最为迅速,随后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迅速上涨,甚至超过能源部门。另外,2005 年的油价下跌使得 2005 年的工资增长率低于 2004 年,2009 年尤为明显,2009 年能源、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实际工资增长率^①分别为 15.2%、21.6% 和 22.6%,而 2009 年三部门实际工资增长率仅为 5.8%、3% 和 7.3%。因此,在俄罗斯也确实存在工资上涨效应。

综合以上三项检验结果,俄罗斯除了尚未出现“直接去工业化”现象,已具有其他“荷兰病”的各项病征。

(责任编辑:高晓慧)

^① 采用俄联邦国家统计局名义工资平减掉 CPI 得到。